

# 比丘尼研究—佛教與性別研究的交涉

李玉珍

## 一·前言

佛教中的性別研究——讀者對這樣的主題可能比較陌生，但是卻可能對台灣比丘尼質量傑出現象耳熟能詳，而且十分驚訝好奇。有關台灣比丘尼的研究，的確是佛教的性別研究中重要的一環，近五年中來台探訪的中外學者至少有15位，包括義大利、美加、德國、澳洲等國學者。正值台灣比丘尼的研究成為國際焦點之際，筆者希望對英文世界中佛教婦女研究興起的脈絡，作一番回顧，知己知彼，藉此探討未來台灣的比丘尼研究的發展策略，同時也向讀者介紹佛教研究方法上，跨學科的發展趨勢。

## 二· 實踐性強的女性主義對佛教研究的衝擊——以 Rita M. Gross 為例

現代女性主義的觀點幾乎使得所有學科的研究方法都受到檢討，宗教學研究亦不例外。久被忽略的宗教女性逐漸現身／獻聲，「女性」不僅可以是學術語言描述和研究的對象，如何從女性的角度來呈現她們的歷史也成為重要的學術關懷。尤其在兩性平等意識高漲的現代社會，讀者已經無法滿足於被動、缺乏行動能力和主體意識的「女性」形象。

以往的佛教學者並非不研究婦女，現代具有女性意識的學者也不是只研究婦女問題；關鍵在於，女性主義擴展宗教研究的範疇之後，學術界在方法學和研究方向上多少有些共識。舉例而言，從經典的詮釋到信徒的實踐之間，不再被視為單一方向的全盤接受。信徒依據自身的知識背景和社會處境，都可能成為經典詮釋和教義傳播過程中的變數；其中社會文化規範的性別差異，亦是重要的變數。

女性主義對佛教研究提供三個新的研究視野：1. 象徵符號的性別意涵——譬如研究觀世音菩薩在中國以女相接引眾生的意義時，並不止於修行層面，而將「女神」代表的性別象徵，也考慮到信徒的性別處境。2. 制度化的角色——以往比較注重個別人物的研究，現在注意到團體生活如何形塑規範宗教身分，戒律、僧團和比丘尼的研究都屬於這一類。3. 作為重要的社會與文化架構，宗教如何與女性的個人、團體、社會與文化條件產生交涉，其作用的機制為何——個人的性別意識牽涉到複雜的社會化過程，而且宗教則是生活中不可割捨的一部分，因此宗教如何影響女性的性別角色，以及女性發展的生活策略如何運用宗教，都是值得思考

的議題。

無可諱言，目前佛教研究仍以經典的研究為主流，而揭舉女性主義的佛教研究，甚至以佛教婦女為研究對象的作品，都處於邊緣地位。以1993年出版《父權主義之後的佛教：女性主義歷史、分析和佛教重構》(Buddhism After Patriarchy: A Feminist History, Analysis, and Reconstruction of Buddhism)的葛若思(Rita M. Gross)為例，雖然她的書非常暢銷，許多從不涉獵佛教書籍的女性，也對這本書津津樂道，但是從書評的作者群來看，佛教學術界仍然不知如何歸類她的作品。1997年美加學者群聚多倫多，花了三天來檢討這本書。由於葛若思同時運用宗教學、女性主義來重構佛教史，討論的議題又遍及漢傳、南傳、藏傳三大佛教傳統，架構清楚而細節再議之處不少，因此學者卻仍持保留態度。

葛若思提出「不可分割的方法學」，企圖以跨文化的比較宗教研究調和女性主義和佛教學，為將來的佛教發展建構藍圖。葛若思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處理澳洲的宗教，屬於比較宗教學的訓練，而佛教的女性主義研究，則是她研究非西方婦女的宗教生活的成果。她並不諱言自己的佛教研究底子，相較於比較宗教學和女性主義的宗教研究是最弱的一環。但是她認為研究宗教必須直搗宗教對人產生的意義，而不是以經濟學、政治學等方式來研究宗教。因此宗教研究不能避談宗教經驗的問題，意即內部成員(insider)的觀點。固然外部觀察者(outsider)可以依其學術訓練而拓展宗教現象的廣度，但是內部成員的宗教經驗亦可擴展宗教研究的深度，其關鍵在於兩者的訓練是可以溝通，而非截然兩分。

葛若思的「不可分割的方法學」，顯示很強的實踐性格，也反映歐美女性佛教研究社群的組成特色。從女性主義觀點研究佛教的學者，很多像葛若思一樣，本身不是佛教信徒就是某些修行團體的核心成員。對她們而言，女性主義強調的女性意識覺醒，和佛教禪坐追求真正的自我，是可以比擬的經驗。兩者都是要剝去層層外界強加的刻板印象，顯露真正獨立自由的主體。循此脈絡，她們非常強調宗教經驗，偏偏宗教／佛教研究一向避免的，就是難以「客觀衡量」、「公開化驗證」的經驗。如果像葛若思一樣，企圖從女性的觀點重新詮釋佛教過去的歷史，甚至建構佛教未來的發展，這種帶有運動色彩的研究，就更使保守的學者疑懼了。

女性主義對佛教研究的衝擊有多種層面，並不是所有學者都像葛若思一樣旗幟顯明，但是就研究主題和方法上，女性主義提出的視野和人力，的確擴展了佛教的性別研究。關鍵是隨著佛教國際化，歐美社會接觸佛教的速度越廣越快，兩性關係的緊張也進入佛教研究社群，就像佛教的學術研究和佛教的傳布運動之間微妙的相依性一樣。

### 三·西方比丘尼研究的發展

西方從神學擴展到宗教研究和他們的世界版圖擴張有關，而西方開始對亞洲佛教婦女感到興趣，則是源於英國統治印度。1892年舉行的第九屆國際東方學會議上，凱薩琳弗雷(Caroline Foley)和瑪貝爾博蒂(Mabel Bode)首先發表她們對早期佛教中的婦女的研究，之後有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出現；這個時期的佛教婦女研究相當推崇佛教賦予女性的領導權。當時的學術氛圍，是藉佛教對女性的寬容來對比印度教對女性的壓抑。至於政治背景則是以古寓今，藉如此開放的佛教在印度衰微，暗示現在印度文化的不合乎「現代性」——隱喻英國殖民者的文化優於被殖民的印度文化是其來有自。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的研究對象主要尾巴利文經典為主，最受注目的則是長老尼偈，但是佛教婦女領袖的僧俗之別則未被質疑。

1985年黛安娜保爾(Diana Y. Paul)出版大乘佛教的女性形象(Women in Buddhism: Images of the Feminine in the Mahayana Tradition)一書，將佛教兩性平等的議題由早期佛教和印度教的對比變成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的對比。她從經典處理女性成佛的可能性，推論大乘轉身的理論提供女性更多發揮潛力的典範。循著黛安娜的研究脈絡，凱倫朗(Karen C. Lang)開始將性別的觀點引入巴利文經典的研究。以男性為主的僧團，如何將女性物化為情慾的激發者和對象，遂成為佛教性別研究的重要主題。黛安娜的研究也挑戰了前期將佛教婦女視為一個整體、女性地位和佛教的發展一樣全然不變的觀點。西方學者開始更細部、更具體的個案研究，不僅歷史和社會的因素加入佛教婦女的研究，而且僧俗之別也被考慮近來。南西福克(Nancy A. Falk)對比丘尼僧團的建立和消失的歷史考察便是很好的例子。

1990年代佛教的性別研究進入藏傳和其他佛教傳統的比較，因為前者在歐美社會的盛行。而比丘尼研究也和女權運動一樣，在西方女性尋求平等的僧尼身分之際，轉向比丘尼戒律的研究。因為在宗教合法性的架構之內，戒律的比較研究是推動藏傳和其他佛教傳統賦予女性比丘尼身份的經典基礎。釋慧空(Karma Lekshe Tsomo)所創立的國際佛教婦女組織——釋迦提耶(Sakyadhita)——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劑。釋迦提耶每兩年於亞洲舉行年會，聚集全球各地的佛教婦女，針對尼眾的教育機會、受戒傳承、社會參與提出討論，會後由釋慧空集結出書。

釋迦提耶出版的書籍包含兩部分：由亞洲婦女介紹她們自己的佛教傳統，和西方佛教婦女信仰佛教的經驗。亞洲佛教尼眾最迫切的需要是教育，而西方尼眾則在基督宗教的社會中尋求認可，雖然彼此面臨的處境不盡相同，但是透過溝通，跨國界的姊妹情誼於焉滋長。最重要的是，這些書和經驗交流是以英文出版，不但提供亞洲女性克服語言障礙，參予國際社會的機會，也擔任向西方世界介紹亞洲的宗教的重要橋樑，引起研究亞洲佛教婦女的興趣。

對於西方讀者而言，釋慧空集結的書使他們思考，何以早經女性主義洗禮、個人主義強

烈、政治意識濃厚的西方婦女，會受到東方傳統宗教的吸引？對釋慧空這樣的西方阿尼而言，如何取得合法的僧侶身分是關懷的重點。還有一些西方學者已經開始注意到西方阿尼對亞洲的尼眾產生何種影響？譬如重建比丘尼法脈的訴求，會不會引起東西文化接觸的緊張？簡而言之，由長老尼偈到大乘的波羅提木叉，西方比丘尼研究和他們對佛教的認知維繫著相生相剋的微妙關係。

#### 四·台灣比丘尼研究興起的世界脈絡

比丘尼研究在台灣學術界仍屬邊陲，遠不及它在國際受到的注目，而且台灣的比丘尼研究極可能是學者、佛教界與西方接觸的結果。發表過有關台灣比丘尼研究的台灣學者，幾乎都是留學歐美，而 1997 年達賴喇嘛來台考察台灣比丘尼教團的情況，更使台灣學者注意到比丘尼戒律的議題。以釋恆清為例，她是台灣最早致力於比丘尼傳承研究的，而其因緣則始於她在美國幫助釋慧空為達賴喇嘛翻譯比丘尼戒律。而 1998 年藏傳代表到台灣參訪比丘尼團體，亦是透過釋恆清的協助。她具有學問僧的身分，以及流利的英語能力，因此受到國際的重視。近年在網站設置中國比丘尼資料庫的釋依法是耶魯大學的宗教學博士，在國際宗教對談中亦十分活躍。

另外，釋昭慧從佛教倫理學來解析僧團中的性別平等，出發點雖然是為了台灣本地的佛教發展，但是從她屢次為西方和西藏婦女向達賴喇嘛請命來看，她和西方的佛教女性主義隔閡不大。而釋見曄出版《台灣尼僧史（壹）釋天乙—走過台灣佛教轉折期的比丘尼》，以及進行一系列的比丘尼訪談，實踐香光尼僧團「比丘尼為比丘尼寫史」的自我期許，也和美國羅徹斯特的于君方教授發展出合作關係。當然釋昭慧和釋見曄的研究反映台灣比丘尼日漸茁壯的主體意識，但是她們亦具有寬廣的國際觀。雖然佛教的性別研究在台灣仍屬邊陲，但是隨著台灣比丘尼教團涉及其他比丘尼法脈的重建，以及台灣佛教日趨國際化，未來台灣比丘尼研究的發展，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關鍵在於台灣本地的學者和僧團，在國際化的趨勢之下，進行比丘尼研究的策略。

提昇台灣的比丘尼研究國際化，自然必須用強勢的世界語言—英文—傳達我們的立場和觀點。而語言的借用往往也涉及理論的溝通，兩者都和國際發言權息息相關。目前台灣學者研究比丘尼現象，有借用後殖民理論的脈絡，提醒我們歐美的佛教學者擁有較優越的發言權，因此也可能用西方女性主義的強勢來取代東方姊妹的聲音，賦予亞洲尼眾「傳統父權社會的受害者」這樣的刻板印象，或是以多重殖民的經驗取代台灣比丘尼充滿主體性的發展。

歐美學者——特別是具有女性主義實踐力的學者——固然在國際發言上佔優勢，但是從

女權運動的角度而言，台灣的比丘尼研究有助於她們解決本身的宗教法脈問題，所以台灣學界如果能夠提昇台灣比丘尼的研究，彼此的溝通不會是單方向的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台灣比丘尼教團作為佛教注重兩性平等的楷模，不容質疑，台灣佛教的多元性與現代化，亦領先其他地區，因此殖民論述未必能夠完全解釋台灣比丘尼僧團的興盛現象。

由於國際學界對台灣比丘尼研究的熱衷，使得台灣學界和佛教界本身終究要進入國際舞台，為自己發聲；因此，透過歐美學者和其他區域的尼眾，以學術語言溝通，介紹自己，將是無法避免的趨勢。在此階段，筆者認為不宜將台灣的比丘尼研究限制於殖民／被殖民的論述中，而是以全球化的脈絡定位台灣本身的重要性，肯定我們自己在國際舞台上的不可代替性。與其防範西方學術界持「東方主義」曲解台灣的比丘尼，不如更積極、更主動的參與研究。連台灣比丘尼教團本身，都不乏具有博士訓練以及獨立學術研究能力的成員，何況學界能夠藉由比丘尼研究，很容易和國際溝通，那就不要浪費我們擁有的第一手材料和廣泛了解本地脈絡的優勢。

以佛教在全球化過程中觸及的跨文化、跨社會議題為架構，不但可以顯現台灣佛教的多元化特色，而且有助於舒解台灣佛教目前的問題。以往西方定位台灣比丘尼教團的成就時，常常要面對其他佛教傳統對台灣佛教修行方式的質疑。其中關鍵在於歐美社會對佛教接觸不久，比較嚮往的深入內在心靈的追求，以別於物質文明極度發展的空虛，所以他們對出世苦行的修行方式給予較高的評價。這種羅曼蒂克的想像，和佛教長期在亞洲和各種社會習俗、團體生活互動融合而產生的修行方式相當不同。某些歐美僧尼寧可與世隔絕，在喜馬拉亞山的洞窟中閉關靜坐，而以台灣社會的富裕懷疑台灣佛教徒的宗教實踐。一方面推許慈濟功德會的全球救濟活動，一方面又片面地以慈濟功德會的世界觀，貶抑台灣佛教徒物欲橫流。如果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受戒，雖然語言不通，生活不便，都值得大書再書，因為這是苦行。但是台灣戒場為他們提供的翻譯和特殊照顧，則被視為當然，難得在英文世界被報導。這些對佛教的刻板印象，使得推動台灣佛教現代化的重要功臣——比丘尼——未得到適當的尊重，也忽略她們修行方式的多樣性。

以宗教全球化發展的架構來看，上述東西認知的差距，關鍵在於現代化。亞洲佛教追求現代化，歐美社會卻嚮往古老、恆久不變的佛教，雙方在全球化的過程中，產生種種互動，其複雜程度不是殖民和被殖民的差異能夠全部解釋，反而是對宗教同樣的熱衷，使得雙方的接觸和互相調適繼續發生。

## 五. 結論

目前有關台灣比丘尼的研究，國外關注的焦點在二部授戒，國內則更進一步，討論到八敬法議題，兩者都屬於性別研究的範疇，其本質也都是爭取兩性平等的運動。這種現象，除了是西方女性主義與入佛學研究交涉所致，更顯示社會上女性意識的高漲，也影響到宗教領域的兩性倫理。極具主體性的台灣比丘尼，在實踐方面可能拔了頭籌，可是仍然有待宣說和定位。歷史是經由敘述而產生的，比較起來，女性的歷史仍然是一片空蕪，急需典範與傳承。因此，比丘尼研究雖然剛開始，卻是十分有行動力和意義的研究領域。也因為涉及不同文化、不同佛教傳統、對宗教實踐不同想像的接觸過程，比丘尼研究充滿潛力，能讓台灣的佛教研究快速而廣的與國際佛教研究對話。筆者相信台灣比丘尼的研究會更發展，也衷心期待台灣的比丘尼研究，不會在國際學術界缺席。（作者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